

另一種台灣田野誌

——李喬《草木恩情》的自然書寫

陳惠齡

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華文文學研究所合聘教授

中文摘要

老作家李喬近期出版《草木恩情》，全書各章皆以植物草木為名，概分六十二篇，並附圖繪。各篇章內容結構大致有三：一為類近圖鑑凡例的博物誌文獻簡介，並兼有客語、閩南方言和漢語等植物命名旨義；二則以生動文字講述各種草木經驗與生命各階段交會的故事（尤以復現童年往事為最）；三則載記植物在地特色與台灣集體歷史記憶的融攝。《草木恩情》不僅展演出小說家李喬「一生文學生涯」中極為特殊的散文區塊，特別是以「草木」為輻輳，表現作者與自然的互動、田野體驗與環境意識等「非虛構」的記錄寫作，此作歸屬「自然書寫」界義，殆無疑義。從文字到現實生活的個人情志、區域生態、族群關懷、歷史追尋、庶民生活史與家國敘事，甚至是鍼砭陳情的寫作姿態，在在透顯李喬有意藉用草木經驗與記憶，見證並構建另一種台灣田野誌。本文因擬將《草木恩情》視為李喬通往在地田野、個人生命史與台灣歷史文化的一份綠色圖誌，冀能按圖尋索李喬如何以文學之筆，及其田野經驗與自然知識，來書寫草木生態，展現喻指遙深的植物修辭學，及其關懷台灣自然和歷史人文的襟懷。此外，

另以生物物種作為書寫主題的《游行飛三友記》，也將列為互文對讀，藉茲掌握李喬書寫自然生態族類的多元視域。

關鍵詞：李喬、植物、地方、田野誌、《草木恩情》、《游行飛三友記》、自然書寫

Another Field in Taiwan

——The Natural Writing of Li Chiao's *“Vegetation Kindness”*

Chen, Welin-Lin

Professor,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Institute of Sinophon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old writer Li Chiao has published the new book *“Vegetation Kindness”*, which records Taiwan's plants and flowers in the field and narrates the self life experience recently. The book is briefly divided into 62 chapters which are named after vegetations and the illustrated chapters are attached. Each chapter structure broadly includes 3 points: first, it is the introduction of notes for the illustrated handbook of similar kind of plants, and their meanings are named in Hakka, Minnan dialect and Chinese; second, it is to use the vivid words to narrate various stories about vegetations' experience and the intersections in each stage of his own life; third, it is involved in the local features of plants and collective historical memory of Taiwan. Therefore, this paper takes *Vegetation Kindness* as a green map leading to “locality”, “life” and “historic culture” to seek for the Li Chiao's diversified and plentiful green rhetoric with far-reaching figurative meaning according to the map, so as to observe another dimension of natural writing in Taiwan. In addition, Li Chiao also uses the biological species as the writing theme of *“Three Friends of Land, Sea*

and Air”, which will also be listed as an intertextual reading, to grasp the multi-view of Li Chiao’s writing of the natural ecological race.

Key words: Li Chiao, *Vegetation Kindness*, *Three Friends of Land, Sea and Air*,
vegetation, locality, field, natural writing

另一種台灣田野誌

——李喬《草木恩情》的自然書寫*

一、前言：作為自然、食物與表現形式的草木菜蔬

「自然」(nature)一詞關涉複雜，就中西文化詞義訓解而言，前者援為哲學術語，主要源於道家，用以指稱「原始本來之態」¹。其義為世界萬物都有其自然狀態，因此人類也要符契自然，並與之相互依存。後者則界定為「世界之本」，就西方文化釋義而言，「自然」即「萬物內在固有的力量」²，此「自然」具有事物的本質、質料或變動來源等意義，因此而有「物理」的涵義³。究此探源，中國的自然觀側重「人類的心靈」(自然狀態)，西方的自然觀則顯現為「世界的構造」(自然法則)。由是，當文學融入自然史時，探索的重點也即是以「人類內在的精神體驗／反思」，以及「大自然的顯示／教導」作為關目⁴。

所謂「自然書寫」(nature writing)或「自然文學」(nature literature)，意指在自然與人文背景下產生，並具有特定主題、文體和風格的一種文學類型。

* 本文初稿宣讀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泉州師範學院和台灣中興大學文學院合辦「自然寫作與環境倫理」海峽兩岸學術研討會(2016/10/26-30)。承蒙特約講評阮秀莉教授給予建議，復蒙本學報匿名審查者惠賜卓見，今適度修正以成斯篇，謹深致謝忱。

¹ 參見陳鼓應註譯，《老子今註今譯及評介》，《老子·第五十一章》：「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0年)，頁235。陳鼓應註譯，《莊子今註今譯》《莊子·田子方》：「夫水之於洵也，無為而才自然矣。」(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4年)，頁591。

² 參見安伯托·艾可(Umberto Eco)編著，彭淮棟譯，《美的歷史》(台北：聯經，2006年)，頁83-85。

³ 見亞里斯多德(Aristotle)著，李真譯，〈第三章〉，《形上學》(台北：正中，1999年)，頁10-11。

⁴ 有關「自然」複雜演變過程所衍生豐富概念及其涵義，非本文可竟其功，此處僅簡要概括。

以第一人稱寫就的散文、日記文體，並以寫實方式來描述作者由文明世界走進自然環境時的身體和精神體驗⁵，堪稱是自然書寫的典型範式。夙負盛名的自然書寫作家亨利·大衛·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名作《湖濱散記》（1854），即是以散文、日記形式，記錄「走向林野」和「離開林野」的湖畔生活，並開展「回歸自然」和「探索人生」的寫作命題⁶。若以梭羅作品為據，就其書寫形式、主題內涵與文類表現，大致可歸結自然書寫三大要素：一、寓託環境意識與土地倫理；二、強調人類在自然界的生存位置；三、具有獨特的文學形式和語言⁷。

有關台灣自然書寫研究，近年來已成為顯學，研究成果則為作品研析與理論建構，諸如吳明益、簡義明和李育霖諸作⁸。審諸前賢諸作，關注面向與論證取徑或有異趣，析論聚焦的作家作品分類，則多有重出，諸如馬以工、韓韓的「環境書寫」、徐仁修「荒野書寫」、陳冠學和孟東籬的「田園文學」、陳玉峰「山林書寫」、廖鴻基與「鯨豚書寫」、凌拂的「植物書寫」、方梓的「野菜書寫」、夏曼·藍波安的「海洋書寫」、劉克襄的「鳥類觀察」和「動物書寫」，以及吳明益的「蝶道踏查」與「河流書寫」等等。由是可知，諸家所定義的自然書寫題材，大致以自然物種（動植物）和自然環境（山川田園）為要，即使刻繪敘寫人與田園、荒野或山林等自然場景的互動往還，衍生沿用的還是「草木鳥獸蟲魚」的題材。

⁵ 參見趙一凡等主編，《西方文論關鍵詞》（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2006年），頁901。

⁶ 亨利·戴維·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著，吳明實譯，《湖濱散記》（香港：今日世界，1975年）。在「我生活的地方，我為何生活」篇章中，最能體現梭羅身處大自然中的自我心境，以及他對於所處土地的認識、想像、考察與描述，其中更富含他的環境意識、土地倫理觀，以及對於荒野的審美觀。如「只要我能使這片田園自生自滅，它將要生產出最豐美的收穫。」（頁76）「我生活的地方更靠近宇宙中的那些部分，更靠近歷史中最吸引我的那些時代。我生活的地方遠遠得跟每天晚上天文家觀察的那種地方一樣。」（頁79）。

⁷ 吳明益界定「自然書寫」者有六項（以自然與人的互動為描寫主軸、創作歷程中實際的田野經驗、自然知識符碼的運用與客觀知性理解的行文肌理、以個人敘述為主的書寫、逐漸發展成以文學雜糅史學、生物科學、生態學、倫理學、民族學、民俗學之獨特文類、呈現不同時期人類對待環境的意識），大致亦涵蓋此三項重點。吳明益，《自然之心—從自然書寫到生態批評：以書寫解放自然 BOOK3》（新北：夏日，2012年），頁36-43。

⁸ 吳明益諸作，《臺灣現代自然書寫的探索 1980-2002：以書寫解放自然 BOOK1》、《臺灣現代自然書寫的作家論 1980-2002：以書寫解放自然 BOOK2》、《自然之心—從自然書寫到生態批評：以書寫解放自然 BOOK3》（新北：夏日，2012年）；簡義明，《寂靜之聲—當代臺灣自然書寫的形成與發展（1979-2013）》（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3年）；李育霖，《擬造新地球：當代臺灣自然書寫》（台北：臺大出版中心，2015年）。

在上述自然書寫題材分類中，如凌拂《食野之萃：台灣野地生活》、《山·城草木疏——綠活筆記》等「植物書寫」，以及方梓《采采卷耳》、《野有蔓草：野菜書寫》等「野菜書寫」，可歸屬於「草木」類⁹。兩位女作家書寫的植物菜蔬，大致為台灣常見野生、可供食用的草木，書名則不約而同援借《詩經》文句，看似遙擬原初農業生活的自然生機與豐富野趣，卻是寓託日常生活空間故事的感悟：

我只想探索自己的周遭，把蓬生的野地納入文學生活，描繪這些野草，心裡想到的是詩經，陌上桑麻，採食野蔬豈在徒沽野味，生活中的故事才是重點，……希望切入的角度是野地生活，展現的仍是文學。¹⁰

二〇〇〇年我回溯敘述自己的童年，循著《詩經》的野蔬投射庶民的生活，我以常見的蔬菜映照母親輩台灣女人的性格，以及花蓮農家的樣貌。¹¹

綜上，凌拂和方梓自然書寫所蘊含自我生命的觀照，藉由〈書序〉或書名副標，並揭示作家取徑「植物菜蔬」所表徵自然生活、尋常作物，以及作為文學表現形式的多種意義循環與張力，包括以菜蔬喻寫，並深情頌讚台灣女性。

在台灣文學界夙負聲名，著作等身的老作家李喬，近期出版兩本特別的散文集：一為載記台灣田野草木生態史，間亦回溯生命體驗的《草木恩情》¹²；一則以游水、行陸、飛空等三類生物作為書寫對象，表顯生態關懷與殺生懺情的《游行飛三友記》¹³。兩書各以六十二篇成書，每篇計有一至四類物種不等，內容除了觀察省思人與萬物的對應關係，也照見老台灣山村即景與生活記憶。就動植物主題與書寫形式而觀，兩部連作所表現作者與自然的互動、田野體驗

⁹ 凌拂，〈新版序〉，《食野之萃：台灣野地生活》（台北：時報文化，1995年）、《山·城草木疏——綠活筆記》（新北：無限出版，2012年）；方梓，《采采卷耳》（台北：聯合文學，2008年）、《野有蔓草：野菜書寫》（台北：二魚文化，2013年）。另洪素麗，《十年詩草》（台北：時報文化，1993年）、《十年散記》（台北：時報文化，1985年）。雖也有多篇花卉蔬果作品，但因集中非盡為自然書寫之作，本文暫不列入討論。

¹⁰ 凌拂，〈新版序〉，《食野之萃：台灣野地生活》（台北：時報文化，1995年），頁4-5。

¹¹ 方梓，〈新版自序〉，《采采卷耳》（台北：聯合文學，2008年），頁17。

¹² 李喬著，蘇芳霽繪，《草木恩情》（新北：遠景，2016年）。

¹³ 李喬，《游行飛三友記》（新北：遠景，2017年）。

與環境意識等「非虛構」的記錄寫作，概屬上述界定的台灣「自然書寫」文類，殆無疑義。

《游行飛三友記》，蒐羅生物類種，極為駁雜，蜘蛛、蜈蚣、馬陸、蟑螂、蚊仔、蒼蠅、蛔蟲、肝吸蟲、細菌、病毒等，皆涵攝於內。作者以〈保蟲〉開篇，並以「保蟲人類」、「台灣保蟲」貫串全書，藉此寓託「人性與文化之辯」的「現代懷疑論」（《游行飛三友記》，頁 11-14、143、185、217、232 等）。李喬嘗言撰寫兩作的異樣文心：寫草木之文，大多「心平氣和」；寫游行飛三界，則「心境不可能清靜無波」。究其因，人與植物的狀態，一動一靜，彼此「刺激反應」較為平靜；至於人與游魚行獸飛鳥，則是以動態交往，最終則趨於動物生命觀象的「死亡」之境（《游行飛三友記》，頁 244）。

以植物草木為名的《草木恩情》，附有圖繪，各篇章結構內容大致有三，一為類近植物圖鑑凡例的文獻簡介，並分以客語、閩南方言和漢語，簡述植物命名旨義；二則以生動文字講述各類草木經驗與生命各階段交會的故事（特別是以復現童年往事為最）；三則載記植物在地特色與台灣集體歷史記憶的融攝。

李喬此作以「草木」為材，主要記述生活經驗中，對於台灣田野自然生態的綜合觀察，全書既不是以詩意棲居為主題，也不具有歸田園居的抒情調性，因此有別於將生命沈澱、澄清於土地的陳冠學「田園文學」¹⁴，也殊異於濱海築草屋，以尋求「第二度的純樸」的孟東籬「隱逸札記」¹⁵；究廣涉台灣田野植物的知識與詮釋面而觀，更不及陳玉峯以調查數據，嚴謹寫就「植被物種生態」或「山林書寫」的生態資訊與專業成果，例如誤將「咬人狗」、「咬人貓」視為同一類目等等¹⁶。此外，李喬將自然花草與珍愛護惜的感情繫念於一的筆調，也有別於前述女性作家，以抒情視角刻繪自然絡草經綸的古典筆調¹⁷，或是將植物草卉類比為台灣傳統女性的書寫關懷¹⁸。然而《草木恩情》卻展演出

¹⁴ 陳冠學，《田園之秋》（台北：前衛，2007年）。

¹⁵ 孟東籬，《濱海茅屋札記》（台北：洪範書店，1985年），頁 59-66。

¹⁶ 相關資料參見陳玉峯，《台灣植被誌第九卷·物種生態誌（一）》（台北：前衛，2007年），條目 60「咬人狗」，以及條目 63「咬人貓」諸說，頁 399。

¹⁷ 張曉風之論評、凌拂〈食野之革·自序〉，皆點出《食野之革》細細描容眾芳草的詩思文字與潺緩情質。同註 10，頁 13、27。

¹⁸ 王鈺婷〈原鄉的菜蔬體驗〉和鄭淑娟〈在平凡中尋求不平凡〉二文，亦論及方梓蕸菜蔬

小說家李喬「一生文學生涯」中極為特殊的散文區塊（《草木恩情》，頁4），特別是以「草木」為輻輳，從文字到現實生活的個人情志、區域生態、族群關懷、歷史追尋、庶民生活史與家國敘事，甚至是鍼砭陳情的寫作姿態，在在透顯李喬有意借用草木，見證並構建另一種台灣田野誌。

援此，本文擬將《草木恩情》視為李喬通往在地田野、個人生命史與台灣歷史文化的一份綠色圖誌，冀能按圖尋索李喬如何以文學之筆，及其田野經驗與自然知識，來書寫草木生態，展現喻指遙深的植物修辭學，及其關懷台灣自然和歷史人文的襟懷。至於另一連作《游行飛三友記》，也將列為互文對讀，藉茲掌握李喬書寫自然生態族類的多元視域。以下即由李喬個人經驗及其生命史出發，分就「作為地景的田野植物」、「草木劇場與自我生命故事」和「植物演化與台灣歷史的交匯及其隱喻」三個面向，探述李喬草木經驗與生活記憶中所勾連的台灣植物史和庶民史，以及族群家國等歷史大敘事。

二、作為地景的田野植物

《草木恩情》一書，據以採樣的草木種類豐碩，總計收錄六十二篇草木文章。李喬自詡還有五、六十種「十分親近」的草木，尚未列入書寫，顯見對於台灣田野植物極熟極博。

（一）台灣的自然田野景觀

「草木」對於創作量豐沛的李喬，當不只作為開拓書寫的另類題材，在早期短篇諸作中已見多種植物登場，如以「鹿仔樹」興衰，喻指地景滄桑變貌；或是在追尋詭麗植物之旅的情節情境中，寓託政治意識等等¹⁹。至於長篇諸作，如《情世界：回到未來》已見大篇幅勾繪苦茶樹及其搾油步驟，此外，藉「草木」書寫而大話「藥草」、「草藥」之自然知識與民間療法，也見於《散靈堂傳

暗喻女性或敘寫女性面對社會遷變的處境。同註11，頁296、288。

¹⁹ 見李喬，〈那棵鹿仔樹〉，《李喬短篇小說全集·3》（苗栗：苗栗文化，1999年），頁278-300，以及〈某種花卉〉，《李喬短篇小說全集·8》（苗栗：苗栗文化，1999年），頁310-328。

奇》²⁰。集植物品類於一，而將生活與文學統彙為二合一的述寫之姿，可謂將「自然植物」植入文學性符號或修辭想像，而意圖建構某種意義。類此之作，繁不及備載，顯見李喬草木敘事學，較諸其他作家更具想像性與多元化。在《草木恩情》〈前言〉、〈後記〉中，李喬坦然揭現鍾情草木的時空內幕：

我的生活園地、觀察、思索環境，都在苗栗「山線」這個空間。……書房群書外，最親最密的還是草木與群山。群山、草木填滿我心靈內外。我有時感覺到又置身童年時期那種身心內外都是草木，而恍然彼此一體的感與受……。 (《草木恩情》，頁 6-7)

在我生命史上，《草木恩情》所述只是取樣，就老年至現在每日，或數日間接觸到的就還有數十種。(《草木恩情》，頁 253)

李喬與草木田園相互依存的親密關係，由是可知。「草木」原是台灣田野的自然與地景，藉由人與植物的交會，不僅照見作者的童年記憶，也間接繪製出家鄉（苗栗）的田野地圖。

複雜的植物生態系常被簡化為模糊的綠色概念²¹。即使植物被視為自然地景的一部分，也具有足資辨識的性質特徵，人們卻依舊習於籠統整合所看見的植物，而鮮少關注根植於時間與空間摺縫中，已然「在地化」或已經成為少見的「鄉野流浪客」的草木特色²²。就李喬考掘植物學名、產地的內容而觀，《草木恩情》中的植物雖非盡屬台灣或苗栗地方特有種，然則藉由作者「重述」回憶與「重塑」草木，恰恰見證了台灣田野植物史。如全書開篇首登場的即是作者原鄉「番仔林」的植物群：

實際上「番仔林」是泰雅人舊居地，無論耕作打獵都不適合而遷徙；漢人得到默許才移入的。……「當年」番仔林是真正荒山莽野。那樣的山野，草本植物最強悍的就是菅草。(《草木恩情》，頁 8)

²⁰ 見李喬，〈鄉野、奇情、藥草〉，《散靈堂傳奇》（新北：印刻，2013年），頁 62-65。

²¹ 理查·梅比（Richard Mabey）著，林金源譯，〈引言〉，《植物的心機：刺激想像與形塑文明的植物史觀》（新北：木馬文化，2016年），頁 45。

²² 「鄉野流浪客」語出《草木恩情》〈茅仔〉（頁 47），李喬用以形容現今已少見隨風搖曳，翠綠優雅的「茅園」。

滿山淡黃粉白的菅芒花叢，是台灣常見也最典型的鄉野景觀。《原色野生食用植物圖鑑》載記「臺灣全境山野處處散見或廣大群生」的植物，即是菅草（五節芒）²³。李喬除了詳述，菅草作為耕稼時期編造屋頂牆壁與耕牛飼料的農產特性外，也直指菅草特具「葉齒」尖銳如刀的自衛本質，並藉此反照自己的性格與際遇。此外，菅草作為介質，再現台灣原漢族群的土地爭奪史，也讓縮結植物與台灣草萊初關的土地故事，於焉浮現。

《草木恩情》以〈菅草〉作為綠色族群的初登場，復以〈禾仔〉收梢全書，其意即在於規模出最典型的台灣本土田野景觀。客語「禾仔」即是「稻米」，是人類重要糧食之一，也是最具可見度與特徵性的台灣農村地景：

《草木恩情》壓卷，以悠然而感恩之心寫「禾仔」。……就我個人而言，少青時代，在農莊可以看到高一丈多、大大小小很像中東或俄國的伊斯蘭寺廟的圓錐形高塔。在清涼午後或有月的晚上，金黃色「稈堆」是徘徊玩耍、躺臥幻想的絕妙「空間」。（《草木恩情》，頁 249-251）

「稈堆」，原是各國農村尋常景物，在李喬筆下，「一身是寶」、是「人類恩物」的禾仔景觀，卻輾轉托出台灣農業社會的歷史與風土人事，並躍昇為「親切經驗」與「神聖化」的生命視景。

《草木恩情》攝錄的植物草木，皆非稀有草木，而是台灣山鄉習見，可供食用、農具、生活器材或藥用的庶民性植物，如蕃薯、芎蕉、杙仔、油茶、鹿仔樹、山棕仔、香茅等。誠如作者所言，這些都是熟悉而「有情的」草木（《草木恩情》，頁 253），因此連結「眼前真實地景」，再現「往日生活經驗」的草木書寫，即意在勾繪老台灣的地貌與視景。

有關「地景」概念，或可從兩個角度來理解，一地景是觀者眼中呈現的地域，因此呈顯的是主體性的反應或經驗；二是來自於個人和社會（內在者與外在者）的差別，此中涉及生活與非生活在地景中的人們觀點²⁴。審諸李喬於書

²³ 許喬木、邱年永，〈凡例〉，《原色野生食用植物圖鑑》（台北：南天，1986年），頁 233。

²⁴ 黃孫權，《綠色堆土機：九零年代台北的違建、公園、自然房地產與制度化地景》（新北：獨立媒體，2012年），頁 31-32。

中一再申明自己是「山居遺老」、「山野人家」，並頻頻敘及「深山窮人」、「極窮生活」、「窮困歲月」等世事觀照（《草木恩情》，頁 131、78、143、86）。依此觀景線索，李喬「凝視」草木，實攸關「觀察者」特殊敏感的主觀思維與經驗。一如《游行飛三友記》所載生物，雖是寰宇大自然慣見的尋常物，但細察篇目名稱：「狗姑拙、黃阿角、石貼仔、矮哥豚」、「雞仔、竹雞仔」、「白翎鷺、白鶴」等，盡皆關鎖困厄年代的台灣客家、閩南山林鳥禽與水域魚類生態景象，其中自然嵌藏作家生命故事的懷舊記憶與歷史場景。

山居田野的植物景觀，是李喬有意引領閱讀者觀看台灣的區域性地景，焦距校準尤在於與過去記憶勾連，迄今猶為台灣常見的農作地景。如〈蕃薯〉一文，即敘寫以蕃薯、蕃薯葉為主要蔬食的「那年代」；〈杕仔（番石榴）〉則是照見家屋前後、菜園角落的零星杕仔樹叢，迥非是今日大規模專營的商品化「杕仔園」。上述追記與敘事，時序架構總不脫離二戰前後期台灣農村社會的片段，作者重現常民史的微觀細節，顯然意在贖回以「台灣草木」為舞台的一段歷史記憶。就李喬呈現的「草木圖像」與「視覺詮釋」而言，固無法包覆台灣田野史的整體，但對於地方性的草木圖誌，卻有其精準而深廣的繪製表現。

（二）苗栗區域的植物地景

李喬曾提及生活圈大致為苗栗「山線」空間，因此草木書寫也以苗栗為多。在地關懷的書寫脈絡中，除了直承對鄉土認同感之外，來自地方景觀改變的記憶反控，卻間接投射了台灣農林產業興衰史。如〈香茅〉一文載明四、五〇年代，苗栗「香茅油」產量，居全台之冠，儼然是獨領風騷的經濟產業，而今卻殘存「香茅寮」點綴荒村野地。〈香絲樹（相思樹）〉則敘及四〇年代桃竹苗丘陵重要農作，如今卻輾轉變身為三義高速公路旁的行道樹，可謂一頁香絲樹滄桑史；至於〈柿仔〉一文，娓娓道來台灣澀柿與日本甜柿的品種交替，並生動講解柿餅脫澀、刨皮的製作過程。〈梧桐、油桐〉寫及近年來極負盛名的苗栗「桐花祭」艷景，間亦鑑照李喬的苗栗鄉土意識。凡此，皆是在時間與空間的摺縫

中，探掘苗栗特殊的綠色地景切面，或許是太熟悉這塊地土的形色品類，所以李喬又引導我們觀看另一種複雜的綠色地圖。

〈刺波仔〉一文突顯的是苗栗大湖名產「草莓」，「刺波仔」另名「野草莓」，或指稱栽植的「草莓」。野莓漫生山徑、菜園邊，代遠年湮的歲月裡，是村童的天然零食與充飢物。而今大湖草莓商機無限，但「草莓酒莊」與「草莓名鄉」的勝地，顯然不及作者記憶檔案中永恆的「刺波仔地景」。在歌頌原生物種的書寫中，不僅寓有地方認同的牽引，也蘊含環境的關懷，特別是目睹日遭破壞的綠色地景，作家原屬自然觀察的書寫，也轉為現代化反思與綠色環保的生態批評意識。因草莓產業之需，而拓寬路面並砍伐 280 棵老樟樹的慘劇情節，也重出於〈樟樹〉篇章中。在繪製眾所稱美苗栗台三線「綠色隧道」之際，已見李喬蓄積滿腔義憤與悲情：

兩百八十多棵五六十年的樟樹「齊地」砍伐，「樹屍」地面上部分被移走、毀屍分屍之後，筆者和許多朋友去憑弔好幾回「老樟喪身」地段。……故鄉大湖的樟樹綠色隧道被毀。（《草木恩情》，頁 42-44）

「為草木代言」、「與大自然相親」，是李喬撰寫《草木恩情》的鮮明信念。大自然不僅僅是所崇仰的聖物，也是他療癒童年創傷的祕境，李喬因此自稱是「生態人口之一」，並直呼草木是「兄弟姐妹伯叔阿姨嬸嫂」（《草木恩情》，頁 7、93）。此作者之悲的文學情節也衍生出另一種思考向度：人類名之為「利用厚生」的土地開發，是否即是對於自然的一種宰制形式呢？對於人類自尊自大的控訴，亦浮現於《游行飛三友記》〈蜈蚣〉、〈馬陸〉文中歸罪於即將把所有生物攜往毀滅之路的「邪惡的保蟲」（人類）。有謂「在現代政治地景裡，『自然』必須被視為政治的，而非一個描述性的範疇。」其意認為「自然」將變成由多方界定與控制，不僅關於非人類，也關乎不同人們生活態度的領域²⁵。泛政治化的自然觀，不獨有偶也牽扯蔬果的更名，如醃製後的「芥菜」，名之為「覆菜」或「仆菜」，在風聲鶴唳的年代裡，「覆」或「仆」之字義，因有影射「顛覆」之嫌，

²⁵ 同註 24，頁 26。

隨即更名為「福菜」（《草木恩情》，頁 220）。類此匪夷所思的草木側寫與政治意識的投影，可謂荒謬而有深意存焉。

李喬對於苗栗草木地圖遷變的感喟，或緣於自然草木與自我情志關係的「位置感」，但也來自於「植物馴化」的深沈思考，如〈芎蕉〉一文，即用力著墨於公館一帶的芎蕉變裝秀：

那巨株濃綠的芎蕉叢或芎蕉園悄悄換裝了，稍微注意就會發覺，那「假莖」變矮小了，株葉色彩變淡、淡黃帶綠；最特別的是扇形葉比較窄而短小，而且總是滿滿裂痕，好像小鎮路旁在地選舉時多色多形的宣傳彩旗。（《草木恩情》，頁 19）

公館蕉叢樹影蛻變，是因為改植芭蕉，而廢除原生種芎蕉。兩者雖是相同類屬，且各有醫界、食療界的擁護與新解，但李喬關懷的焦點，卻在於農作物改良的優劣。「水果演化」，固然呈現種類繁多、物美價廉的改良之功，但李喬卻進一步統整生物演化過程中適應環境的「被動說」和本身自然趨向完美的「主動說」（《草木恩情》，頁 115）。有關「植物馴化」辨證問題，原本即關涉「自然環境壓力」而迫使植物改變自身的性質特徵，但另一方面「植物馴化」過程也衍生出植物特徵的消失，則來自於人類一味追尋「栽培化」的後果。如是而觀，植物的變異，究竟是基於植物本身的自由意志，或是人類行為介入造成的影響²⁶？這是李喬此作間接引渡的重要思辨。由在地植物生存悲劇的觀視，而至揭示並反思人類與其他物種之間的關係，人類行為與自然環境的互動影響，頗有生態導向的草木書寫樣貌。

上述以綠色地圖為喻，簡要梳理李喬描繪的地方性植物。《草木恩情》浮雕的綠色圖誌並非虛幻，它的取樣是摹製地面且與地景相符的書卷。

²⁶ 同註 21，頁 33-35。

三、植物劇場與自我生命故事

自有生靈以來，人類與自然便開啟交織互動的歷程，迄今延續不絕。就某些人而言，「自然」是對一切事物內在秩序的概括，所謂「客觀化的自然」；另一種則是「個體化的自然」，意即投射個體內在生命的認同，而興發對自然的孺慕之思²⁷。以李喬而言，認同的自然為「草木藻類」（《草木恩情》，頁 46），這是因為草木與他生命多有交會纏結。

（一）童年往事再現：「活命恩物」與「綠色空間」

在人們與過去重逢時，總會有某些斷片存在於其間。斷片雖只是碎裂殘片，但卻具有「方向指標」的作用，本身且形成了一條連接過去與現在的紐帶²⁸。《草木恩情》各篇章幾乎都以「記憶底層」和「童年歲月」為敘事起始，草木不僅發揮「往事再現」的作用，也同時扮演「活命恩物」，並具有「綠色空間」的特殊意義。「草木」於李喬而言，因此可比擬為一種「斷片」，是過去與現在的介質。

祭上敬虔的感恩與學習，大概是所有自然書寫的基本姿態。李喬於《游行飛三友記》中對於殺屠、食用以活命的游行飛三類，雖也有頌揚感恩，卻有更多的懺情與領罪。而《草木恩情》裡的草本類或木本類植物對於李喬而言，則是生命成長史中的「活命恩公」或「救命恩人」。前者指裹腹充饑或種植以維生的植物，如貧困年代的主食「蕃薯」、「芎蕉」、「藕薯」；以及物資匱乏年代補充油類脂肪的唯一來源「蕃豆」、美味零食兼可充饑的刺波仔等；至於後者則指具有經濟效益的植物「杉仔」等。以「杉仔造林」為例，這是童年一處可以耽溺於幻想的堡壘之地，此外，「造林」所得豐沃，也可紓解困境，改善家計。「杉仔，實實在在是我的救命『恩人』」，所謂「救命」之恩，直指草木的經濟效益。實則《草木恩情》所臚列之植物大都具有經濟價值，對於李喬謀稻粱與購

²⁷ 王學謙，《自然文化與 20 世紀中國文學》（長春：吉林大學，1999 年），頁 1-3。

²⁸ 宇文所安著，鄭學勤譯，《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台北：聯經，2006 年），頁 93-94。

屋置產最具效能的尤其是「蘭花」²⁹。「草木恩情」不僅是書名，也是全書輻輳的命題：

人類存活基本是草木所賜，而人類以草芥為鄙卑的代稱。不知他人感與動如何？我一生尤其到了老年，日夜時分，是滿懷對草木的感恩。（《草木恩情》，頁7）

草木故事不僅鋪展李喬老年世路的感恩心境，也推衍出往日童稚時光的懷舊況味。「豆棚瓜架」原是古遠年代，農閒時分講古清談的場景，〈菜瓜〉文中敘及台灣山區菜棚下，是老人、婦女「揣冇鮮」（吹牛或說稀奇古怪事）的舞台，也是小孩子「拈揚尾打草蟻」的趣味空間（《草木恩情》，頁212）。綠野田疇所凝聚李喬童年的祕境寶地，多數是探險尋異的遊樂區和幽深怪異的綠空間。如「牛筋草」特區是寂寞童年的遊樂場；「刺波仔」山野，是採食解饞與打群架的「秘境寶地」；「糖梨仔」則是孤獨童年的療癒與歷險之奇異空間（《草木恩情》，頁179、57、224-225）。上述藉由追溯童年往事的片段，構制了小小的草木風景，然而童幼歲月的草木世界卻也兼具「殘忍」與「慰藉」的二重悖逆性。被戲稱為「關係嚴切」的「鴨公青」和「桂竹」，證諸李喬與草木的恩怨糾葛，多少恨事皆肇因於被用來毒打孩子的「桂竹枝」；至於可製為藥方的「鴨公青」，也曾因被截刻為「極樂仔」（陀螺）（《草木恩情》，頁54、212-216），而使作者遭致責打。「桂竹枝」或「乒乓子」，皆非李喬鍾愛之物，但菅草叢裡和乒乓子叢中卻是藏身避禍，或「養心傷」的祕密基地：

又因為四周有高大杉林護衛著，強風不侵，烈日外擋，……我在「牛肝石乒乓子」叢中真是獨樂樂，自由自在。有委屈、傷心、憤怒，或想向誰傾訴什麼，就是有月色的晚上，我都會爬上山來到這裡。（《草木恩情》，頁70）

²⁹ 詳情可參《草木恩情》〈東方蘭與我〉和〈養蘭春秋〉二文，頁145-152。

草木世界具有的「我城」空間感，結合了作者李喬的童年往事，儼然成為幽深怪異而神妙奇幻，同時兼具「隱蔽所」(Refuge)和「光明地」(Prospect)的烏托邦空間特質³⁰。林木花樹空間因此不僅是現實存在物，也是一處隱祕的藏身處和避難所，李喬在這微型構建的神遊空間中，既可以曝亮自己，也可以療癒挫傷，數後並藉由可藏身的「黑暗地」，逐漸邁向未來的「光亮處」。

(二) 生命情志的投射：反抗、懺情與追憶人事

《草木恩情》中的綠色空間，除了引領探溯往日時光，輾轉其間，所推衍的草木意識，顯然也有不同層次而託寓遙深的意涵，包括李喬個人生命特質，如反抗哲學、懺情告白，以及縈繞人事風華的生命經歷。

有謂「一草一木耐溫存，留予他年說夢痕」³¹，旨趣乃在於體味自然物景帶來的生命之趣味與啟示。藉由草木的聯想，讓李喬順勢召喚並標記歷史年月中浮現的人事光影。〈豬嬖乳〉是台灣常見的野菜，中國北方亦稱為「馬汁菜」(「馬乳」)。在作者筆下，「豬嬖乳餃子芯」的獨家美味，除了表顯豬嬖乳餵養農民的恩情，也由此繫連昔時農校李師母溫柔關愛之情。全文藉家常烹膳而遙想故人，並延伸出悼亡悲愴情事。類此追憶而餘恨悠悠之作，尚有〈葛藤〉一文敘記母親於田間鋤地，而以葛藤圈圍幼童活動的搖籃式空間。葛藤引渡出辛酸又甜蜜的往事，油然而興發人子思母之情。〈梧桐、油桐〉則刻繪日治時期，與即將徵調赴日受訓的二哥，重逢梧桐樹下的記憶即景。〈藕薯〉一文，同樣載記日治年代「便利粉」諸般食物記憶，並循此思想起與亡友鐘鐵民爭辯正宗「板條」的歷歷往事(《草木恩情》，頁109、209、228)。上述草木記憶中的人物，皆已從人間舞台退場，草木情節中只見深植無盡的傷逝與感喟。藉草木野菜落實回憶，重組往事，這是李喬在直觀自然之際的另一種感性的抒情與詮釋。

³⁰ 所謂 Refuge (隱蔽所) 意指古代人藉山洞，保護自己，躲避野獸之謂；與之相對概念的 Prospect (光明地)，則指光亮的曠野。由此喻示人類從「隱蔽所」走到「光明地」的歷史進程。參見張系國，〈竹塹堡、科技城與烏托邦／我的科幻小說創作〉演講稿，收於陳惠齡主編，《自然、人文與科技的共構交響——第二屆台灣竹塹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萬卷樓，2017年)，頁14-15。

³¹ 琦君，〈後記〉，《留予他年說夢痕》(台北：洪範書店，1970年)，頁201。

不同於上述感懷式的草木觀照，李喬另一種草木賦形書寫，則表現出知性與思辨性的評介。「反抗意識」，是貫串李喬多數作品的主脈絡。他嘗倡言「反抗是人性的至高美德」、「反抗先於存在；不反抗就不存在」³²的反抗哲學，然而反抗的具體特質，實為「堅韌自在」的傲骨，以及「無傷他人」的溫柔生命。李喬寓寄個體情志的植物，皆為鍾愛而認同的草木，諸如不卑不亢，自愛自尊，當外力倏爾觸身，即闔起不理的「見笑草」；生命本質溫柔，若無外力侵擾，便恢復悠然自在的「咬人狗」；只知「低頭」悠然蔓生，卻堅忍自強，生命力驚人的「牛筋草」；隨風搖曳而謙虛怡然，雖有鋸齒尖刺，卻不傷人，只默默獻身的「禾仔」。又如從柏油縫裡掙脫，伸莖展葉又開花，極富生命力與攀援性的「牽牛花」，深具李喬歌頌的生命特質，除了指正植物專書所稱「一年生草質藤本」之誤，李喬也將之正名為「蕃薯舅」和「藤仔花」，除了強調其平民性、沒有價值的野草特性外，也旨在表彰培育後的另一番「花牆」麗景。再有身帶銳刺，遠近觀望皆宜，卻不可褻玩焉的「九重葛」，更是李喬理想中的「國花」（《草木恩情》，頁 153、165、179、252、228、240、126-129）。凡此木草花樹的審美形象，寓寄作者自在傲骨的生命本色，皆點撥出李喬自然書寫的另一文脈。

心靈的精神體驗既與自然大地融為一體，草木劇場儼然成為李喬心靈的風景。以「反抗」為存在本質的李喬，在審視「今與昔」、「物與我」之後，對於大自然動植物也有一番懺情告白。人類對於大自然的傲慢與戕害，在此先限縮為童年李喬扮演「自然殺手」的認罪懺情。悔罪的情節包括採食尚未成熟的生芎蕉；砍斫木瓜樹巨幹，作為捕鳥陷阱；謀殺「楓樹蠶」，製成釣魚絲等罪狀（《草木恩情》，頁 20、61-62、176）。凡此傷害草木鳥類昆蟲行跡，都成為不堪回首的惡行惡狀，李喬為大自然發聲，非僅控訴「人類自造孽」，而是更忠實地自我曝現，重申「大去之前，在此公開認罪」，請求寬恕（《草木恩情》，頁 62、176）。這樣的懺情，當然也見於《游行飛三友記》文中，頻頻回首清算檢視虐殺蕃薯鳥等「自然之孽」（《游行飛三友記》，頁 16）。李喬《草木恩情》此作迥不同於陳玉峯《台灣植被誌》系列著作，寓有自然生態保護運動與山林教育的背景，

³² 李喬，〈修羅祭〉，《重逢——夢裡的人：李喬短篇小說後傳》（台北：印刻，2005年），頁 170。

但李喬的「生態良心」，顯然來自與生態環境融為一體的共生共性位置，見諸他以「身為生界之一員」（《游行飛三友記》，頁154），而頻頻以「老兄」、「仁兄」稱呼草木諸君而證之。由是而觀，李喬與自然的關係，已不再是「我和它」的物我疏離，而是「我和你」的親密關係。這是李喬超越「自然書寫」、「生態批評」而特有的「生態倫理」觀，也是他對於自然草木的重新認識。

四、植物演化與台灣歷史的交匯及其隱喻

上述李喬所演繹的植物故事，大都與童年生活有關，其中多數植物是台灣特有種，即或有外來種，也都「安身立命」於台灣久矣，少數引進之新樹種，如「美人樹」等，也是李喬情有獨鍾的「新台灣族」。《草木恩情》一書雖充滿自傳情味，就中也遙指了台灣植物在時間之流的演化，及其與台灣歷史交匯，或類比互涉的隱喻。

（一）台灣田野植物的生存演化

在《草木恩情》書中，除了觀察植物在自然環境中的生存方式與植物外觀外，也藉由作者成長經歷的在場性，一一述說食物轉化為庇護、耕農工具、天然藥草之用，以及作為自然田野與地方景觀等「植物圖像」的故事。此外，也間接記錄了台灣野地植物歷經人類強力介入、人工栽培化或環境變遷壓力下的生存演化，例如野生植物演進為糧食作物；主食作物轉易為山林雜草等變化歷程。這些紀錄並未援用生態歷史文獻的考證，或經過嚴謹的科學觀察，然而李喬卻獨能引領閱讀者參與見證台灣植物演化史，並進而理解這些台灣日常性／野生食用植物，作為「自然資本」的內在價值與經濟潛力，又或者是被視為或收編為「企業生存法則」或「文化產業思維」的某種替代方案或對立物³³。例如〈山棕仔〉一文即敘及山棕變化歷程的故事。山棕，原屬野生種，早期農家取其葉鞘軸的黑纖維，製作為洗滌刷、掃帚，或用以阻塞風雨，特別

³³ 同註21，頁44-45。

是織成防水禦寒的「蓑衣」，葉中梗則用於農家孩童玩樂的寶杖或釣魚竿。待時代遷變，農具新異，山棕漸被淘汰，詎料時移事易，今日卻又重返光輝，搖身化為高價位木床和餐宴珍饈：

台灣人生活品質提高了，山棕這窮老台灣的老山產又重回榮光。可是我知道台灣本身不可能回頭再去繁殖山棕，以謀利求生。最新消息，都市「新野菜主義」的年輕人有了新發現：山棕的嫩莖芽是可口的野菜。
（《草木恩情》，頁 124-125）

顯見山棕歷經「窮老台灣的老山產」到「摩登台灣的新野菜」的角色流轉，已然成為人類生活史的反映者。

「構木」，客家名又稱「鹿仔樹」，依據《原色野生食用植物圖鑑》，台灣平地至中海拔山麓林內或再生林地均易見之³⁴。〈鹿仔樹〉一文說明「鹿仔樹」因鹿仔的主食而得名，古老年代的構樹纖維，不僅是製紙好材料，也是原住民織就被衣，以及農家重要的豬飼料，「鹿仔樹」可謂一身是寶。據史料記載台灣草萊初闢、藝植耕稼之際，多有「鹿場」、「捕鹿」等開發景況³⁵。揆諸李喬名之「前進植物」，意指最早繁殖於新天地者，如鹿仔樹、菅草、油桐等等，顯然持理有所本。自 1969 年後台灣已不復見野生梅花鹿景象，但原本不高不矮的鹿仔樹在山野中依然有其位階，不僅與菅草混生，甚至因高達八公尺以上，代代密植土地上，菅草反而被壓制而逐漸消失（《草木恩情》，頁 137-140）。上述植物生存演化，或因環境變因，而有轉化進程，但植物際遇的背後，也不乏人類介入的軌跡，如木質鬆脆，原不具經濟效益，客家諺語稱為「鬼生鬚，人湊个」（沒用的存在）的「油桐」，即源於「文化產業」概念，歷經改造變貌後，竟產生意義與價值；然而也不乏因慘遭棄置而漸成為荒山草野，或飄零鄉野的流浪客等等³⁶。

³⁴ 同註 23，頁 23。

³⁵ （清）陳培桂編，郭嘉雄點校，《淡水廳志·卷十五下·文徵》（台中：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77 年），頁 434。

³⁶ 參見本文「苗栗區域的植物地景」之章節內容。

上述台灣田野植物演化的視景，源於李喬對於草木的憐惜、感知，以及對於自然興廢的體會，間也展現出台灣草木生態知識及生存演化中極富意義的田野文化內涵。

（二）植物故事與台灣歷史的互涉及隱喻

李喬曾述及吳濁流以「台灣連翹」為書名，意在挪借「連翹」特性與境遇，寄寓作品的主題（《草木恩情》，頁 75）。「台灣連翹」是台灣民間常見的庭院圍籬植物，吳老因此取其「不屈自己的個性掙扎著活下」的生存精神，藉以命題³⁷。《草木恩情》一書敘述重點，或與吳老不同，但藉草木烘托散亂時代記憶和台灣歷史處境，儼然也是一則則「正史」邊緣的遺事。如〈公館紅棗〉一文，開篇即遠溯 1875 年因抵抗光緒皇帝御用徵收，而後始有廣東潮安紅棗幼苗傳入公館陳煥南培植的來龍去脈。作者狀寫公館紅棗歷經風霜，才得以展露皮綻骨突的樹身，索隱派讀者或可緣此想像浮沈於李喬字裡行間，所賦予紅棗「抗暴政來台灣，落腳公館」的象徵寓意³⁸。

李喬以近乎白描的姿態，道盡草木外貌本性，以資比擬並呼應台灣意識，間也映照台灣社會現象。如以「蕃薯」的土拙樣貌，狀繪台灣島嶼形貌，並以蕃薯「謙卑地成長」而營養豐富，物美價廉，來喻指台灣人的草根味與素樸質性；又取「杙仔」（土芭樂）而棄「蕃石榴」之名，也意在強調「土土的」，從未被珍視的「土台灣」形貌色味與真實境況（《草木恩情》，頁 15-41）。〈樟樹〉文中更直接註記不畏貧瘠而能耐風暴雨襲的樟樹為「台灣象徵」：

樸素平凡而能耐環境惡苦，內懷珍寶卻平易近人，生命力堅韌而能成長數百年依然生機旺盛。隱隱是「台灣象徵」……。（《草木恩情》，頁 45）

³⁷ 「台灣連翹」之命題涵義，見於《亞細亞的孤兒》中胡太明觀視被修整成青牆的台灣連翹，獨有一根大樹枝從籬笆底邊隙中穿過，免於被剪厄運，而自由伸展生命力之姿。胡太明因此興發：「要堅強地活著，像台灣連翹一樣。」見吳濁流著，黃玉燕譯，《亞細亞的孤兒》（新竹：新竹縣文化局，2005 年），頁 246-247。

³⁸ 文中另有一段微言大義：「有從中國引進的另系紅棗，但據悉進貢北京的紅棗因水土不服，並未繁盛開來。」見《草木恩情》，頁 91-93。

上述緊密勾連台灣本土性的草木特質，不無將「植物想像」投射為認同台灣的意識，但主要還是在於銘刻台灣孤懸一隅而不被珍視的歷史實境。《草木恩情》不單寓託作者的自然體驗，其中歷經演化磨難的台灣植物，也觸及社會集體記憶與族群經驗。李喬的童年適值太平洋戰火正熾的年代（《草木恩情》，頁 164），生活實境因而糅合了台灣歷史的縱深：

藕薯可生吃，熟食也是豐富的一餐：蕃薯、生芎蕉「四煮」之外，「蒸藕薯」是美食，沾點鹽巴，或幾滴豆油（醬油），吃起來真是「胃舒腸爽」。（《草木恩情》，頁 194）

依據李喬所言，這窮苦人家大餐的寫真年代，約莫是 1942 年左右，在米糧配給管制下，連糖和油都列為配給，養豬數和大小都需須登記列管（《草木恩情》，頁 164）。因此，蕃薯、藕薯都是當時珍貴的「活命食物」。飲食概況如此，起居建築也可從「茅仔」故事一窺究竟。歷經「台灣紅瓦屋」、「茅草屋」而至「日本瓦屋」，〈茅仔〉一文細細解說茅仔築屋的繁複工法，體現了日殖時代的民生住屋史（《草木恩情》，頁 49）。草木書寫轉繹為舊時代生活演義的篇章，尚有〈紅甘蔗、竹蔗仔〉裡描述古老搾糖工場「牛犇地」；〈苧仔〉介紹「做苧仔」的精細工程；〈香茅〉則曲曲勾繪蒸餾香茅油的精密過程（《草木恩情》，頁 80、96、99）。凡此，皆是採用極具實用性的草木，作為再現歷史祖輩生活面貌的摹本。

除了照映庶民日常外，李喬顯然也將台灣重要的歷史事件納入草木記憶，以草木來紀史與載道，如〈牛眼〉一文載及玉井街牛眼樹下葬埋 1905 年「焦吧哖慘劇」的眾英魂屍骨；〈養蘭春秋〉、〈東方蘭與我〉則是將時序從日殖拉回台灣經濟起飛，全台瘋蘭花養蘭花的七〇至八〇年代。草木與史事互涉外，也帶出可資解讀的草木「政治性」隱喻，如〈昭和草〉除了表記 1929 年的「農民組合」大湖支部的「二一二事件」，也敘及日殖時期貧農因將寓有天皇名諱的「昭和草」視為「野草」、「便宜貨」，而惹來偵訊的悲／鬧劇。「草木何辜，人類賦予『政治意義』？是草木可憐？還是人類可笑？」（《草木恩情》，頁 132）不由得李喬慨然系之！

《草木恩情》不獨孜孜探索歷史與記憶，以草木作為敘事線索，更揭現了族群在語言與文化之間的游移辨證關係，如客族稱「七層塔」，福佬族稱「九層塔」的由來：

那些人也許先抵達取得肥沃的土地，植木花串大都是「九層」；反之，後來者只取到較貧瘠土地，「花串」自然較矮短，所以看來「七層」而已。……在客家大社會，年節喜慶日子的兩道菜餚是不可缺席的，……這兩道主菜絕不得缺一個配料，放幾片或一撮拐絲的豆油。（《草木恩情》，頁 77-78）

引文的詮解，強調兩族群先來後到的歷史時間差，後文並持續開展出客語稱「拐絲」（紫蘇）的客家飲食文化。李喬更以生動客家諺語：「有女毋好嫁到番仔林，毋係葛藤就係蔗擊」（《草木恩情》，頁 206），來形容環堵皆葛藤的客族山居蹇困生活。類此異曲同功的草木名義闡發之例，還有客語稱「牛眼」，福佬和華語稱「龍眼」，漢醫界則名為「桂圓」；以及客語名「咬人狗」，福佬語「咬人貓」等等語言反差的趣味（《草木恩情》，頁 242、162）。咬人狗、貓草之釋名，如前所述，或有謬誤，然則李喬意在將多數閩客語彙的錯置與對立，視為多聲部交響的台灣多族群文化現象，則會心不遠。

除了客家族群文化的片段縮影，草木療癒特性也落實於現實社會的氛圍，如〈Tokeso〉一文即以「時計草」（即今「百香果」）可抗癌而思及台灣社會團體、國族、政團黨種種「社會癌病變事況」（《草木恩情》，頁 200），全文雖主訴百香果是特優水果，但變裝演出的「百香果敘事」卻蕩漾出嘲諷的餘波。同樣以觀照花卉草木來質詰當前變動社會亂象，尚有〈牽牛花〉一文，作者先是稱頌牽牛花優雅、平民化而易培植，繼而提出牽牛花在「文化創意」當道下，或也可以創造出如桐花祭的盛景，然而語鋒凌厲一轉，卻大肆抨擊「大塑膠鴨」、「放天燈」汙染大氣、海灘等現代文明公害。作者藉題發揮，直指時弊，不僅嘲諷地將「大小牽牛花很寂寞」的景況（《草木恩情》，頁 228），訴諸公論，也間接指責耽溺於「孤島獨處」的年輕網軍與鄉民們。

審諸《草木恩情》全書的基本構圖，主要取徑草木而追溯既往，不但展示了老台灣社會的各種細節，也把個人記憶轉化為集體的歷史。即便如此，在凝視草木，回眸過往的餘光中，老作家也琢磨參照了不同時代的異同，在反襯「相同歷史與不同記憶」的世代差距感覺結構之際，也不免有物非人非的殘念！同樣的感發，也浮現於《游行飛三友記》文中絮絮叨叨的「老人言」：「就我這個年齡的人」、「我這個年紀的人知道……」（《游行飛三友記》，頁 59、103）。藉此生命小史，提醒新世代「毋忘老台灣」之餘，老作家實式憑之的宜乎是：「自己是生活在歷史中的人，所以有義務提筆記錄或檢視自己生活過的歷史」的創作信念³⁹。

五、結語：一體共命的草木書寫情志

「草木」，作為李喬生命／文學語境中的重要意義，草木書寫究竟如何回應李喬的文學生涯及其生命哲學？純就《草木恩情》此作所提及草木與李喬小說諸作的互文關鎖，概可分述如下：如《情世界——回到未來》所詳述「油茶」的種種情節；《孤燈》文中受虐女性服下「魚藤」自殺的悲劇；《幽情三部曲》文末主人翁離開政治圈，回返故鄉，種植野菜「烏紐草」；《結義西來庵》裡的「牛眼樹」，見證慘烈的焦吧哖事件；《情天無恨》文中的白素貞則是目睹「真柏」移植崑崙山頂後的「再生」，因而頓悟生命形貌之可變（《草木恩情》，頁 110、136、172、245、248）。總此，已可管窺李喬作品與草木的多所纏結與對話。然而正式演義草木故事，或以《散靈堂傳奇》為大觀。

較諸前作，《散靈堂傳奇》堪稱集植物藥草之大成者，「山林藥草」不僅成為鄉野奇情的重要主線與意義符號，並躍昇為全書「散靈堂安靈教」的重要教義：「提倡健康飲食觀念，提示植物物食材」、「推動生態保衛工作，替本鄉草木編製『戶籍』」⁴⁰。此外，《情世界——回到未來》，雖以「性」、「情欲」探述與質疑「未來演化」現象，但就中承繼《散靈堂傳奇》的「草木自然」課題，進

³⁹ 黃武忠，〈人性的探討者——李喬印象記〉，收於彭瑞金編，《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27·李喬》（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2年），頁 169。

⁴⁰ 同註 20，頁 389-390。

行反思「人的自然特質喪失，人就不存在了」的關鍵概念⁴¹，也是有跡有尋。凡此例示，皆可映證草木作為李喬文學創作獨特的演述情境與命題註腳，有其一貫的意圖與精神。《散靈堂傳奇》和《情世界——回到未來》，可謂《草木恩情》之前傳。

惟「草木」終究是李喬小說創作的符徵或話語，其承擔與載荷的所指，實為「大地草木之子」——這個終將「返回山林」⁴²與「自然境」的「人」，也即是李喬本人。《草木恩情》和《游行飛三友記》兩作，是李喬文學創作中唯二的自然書寫散文。作家於訪談中提及：「一輩子寫小說，但散文才是真正的看到我自己。」⁴³對於以小說創作名家的李喬來說，兩部連作所揭示回溯生命體驗與個人精神史的意義，主要鏈結於載記台灣田野動植物生態史。

植物草木是自然環境的一部分，也是庇護人類與大地的重要生態景物，從人類文化的角度來看，植物大都被視為是栽培作物、食物、藥草、製作工具的原物料，更多時候則是被轉用為住屋內外環境的裝飾物。就此而論，植物顯然被視為一種實用物與裝飾品，角色相當於「食物基因的提供者」⁴⁴，充其量也只作為一種「客體的存在物」。然李喬對於植物「形色」的喜惡，則是經相當時間體會、閱讀、「臨場觀看」的結果（《草木恩情》，頁 241），因此有其獨到的「自然生態和諧論」。依其所述〈養蘭春秋〉與〈真柏盆栽〉諸篇，看似並不反對人為後製、建構、培植的第二自然，但卻強力主張必要和環境的形色澤相容、相吸、相引，才是建築的、美學的、生態學的「好」（《草木恩情》，頁 241）。由是，「以自然為尊」的重心與視景，也可印證於李喬拒斥過度戕害植物自然生命力的「盆景藝術」（《草木恩情》，頁 247），這點也類同於自然寫作者凌拂在城市遊牧之後，極力歌頌「野地豐盈」、「野草任縱」，主張「還歸自然」的視野，而認為庭園藝術缺少了野逸能力⁴⁵。

⁴¹ 李喬，《情世界——回到未來》（新北：印刻，2015年），頁 292。

⁴² 同註 40，頁 24-41、4-7。

⁴³ 見筆者參與「客籍文學家李喬口述歷史訪談計畫」，於 2019 年 3 月 8 日 10:00-12:00A.M 於苗栗公館李喬書房訪談內容。

⁴⁴ 同註 21，頁 36。

⁴⁵ 同註 10，頁 6-8。

《草木恩情》的敘寫方式，雖近似《原色野生食用植物圖鑑》的撰寫凡例⁴⁶，如中文名稱、植物學名和別名，以及調理、藥效與用途等等。然而書中最熠閃動人的情節焦距與命題特徵，卻是作者面對植物的心靈過程，草木竟然從「被觀看」的客體，翻轉為作者生命故事的「主導者」。人和草木兩個物種的邂逅，因此有了親密的聯結交織，從而迴旋掩映出許多生命故事的圖像，諸如自然田野地景、植物劇場和童年成長，以及舊時歲月深山人家的生活經驗與時代記憶等等。

《草木恩情》一書刻寫家鄉草木、本土經驗、童年往事與傷逝情懷，並兼及歷史追尋與地方書寫，特別是對於「在地物產」與「庶民性草木」有情與抒情的眷戀。老作家嘗於《游行飛三友記》的前言表明：「筆者是筆耕一生的老人，所以不能也不想追尋游行飛三者的『智識部分』，只談『相處』，認識感受。」⁴⁷（《游行飛三友記》，頁5）循是而論，《草木恩情》雖兼具智識性觀察與浪漫想像，如前所述，李喬雖懷有生態危機的現實感與批判意識，卻終非是嚴謹田野調查的自然誌，或全力聚焦於環境保育責任的環境文學。整體而言，李喬此作趨近於隨想式的自然書寫與地方田野的經驗視察，因此不同於主流「自然書寫」的精準、密集、視覺、考察、觀察、詮釋理論，以及鮮明「生態環境倫理觀」的學理性與載道式的命題，一如陳玉峯《台灣植被誌》系列所偏重台灣植物社會的全盤結構、地區植被誌及物種生態誌等的全觀輪廓，及其所提供台灣深度物種解說的資訊與研究的素材。

李喬以草木為載體，重返當年生活於山野的記憶與體驗之作，顯然與方梓取徑花樹菜蔬，「再一次回到童年，再一次敘述父母故事，花蓮人的事跡」的典型的台灣自然經驗⁴⁸，略有異曲同工之妙；而李喬以草木花樹為篇名，串連為類植物小百科的文類，也似乎貼近凌拂以各篇「說文解草」，一一賦予草木個案

⁴⁶ 見同註 23。

⁴⁷ 有讀者於「遠景文學網—書評」，論及李喬《草木恩情》內容，錯誤頗多。類此負評，對於「文學作家」而非「植物學家」李喬而言，不免過於尖刻。見遠景文學網—書評，〈執行編輯大人，你該加油了〉，（來源：http://www.vistaread.com/reviews_dtl.php?action=view&id=179，2018年8月17日）。

⁴⁸ 同註 11，頁 20。

形態更為明確的存在與界定，而寫其當年行於田野，體驗、認知自然奧義的綠活筆記⁴⁹。

相較於上述自然寫作名家名作，李喬初嘗試自然書寫的體現與實踐，雖有其生態批評觀，諸如質詰人類的思想、文化、經濟、科技、生活方式與社會發展模式與自然環境的關係，藉此彰明人類歷史與自然史之密切關係⁵⁰。然而李喬強力昭顯的創作立場始終是「與自我生命同在的自然生態觀」。在此面向上，李喬非主流與典型性的自然書寫，顯然更近於重視人類（人文）與自然相互交織的生態導向的文學，而非單純描寫自然，或過度切割人與自然的二元對峙的一般自然書寫架構⁵¹。《草木恩情》所有的書寫意圖、觀察感覺與別具意義的敘述，在在落實了李喬生命與草木同在的書寫情志：

草木與我的種種，在老年歲月，幾乎取代我人世的點滴。意念心思到此，油然萌生動機：何不趕速筆記懷思心情，兼述草木與我之間種種往事與懷念、領會？……並祈求不久的將來我「回去」時，能夠被接納。
（《草木恩情》，頁 7）

我是一個「心境與處境」時刻對應銜接的人，選擇與草木對話為寫作的結束，或許是一種「逃避現實」的方式與某種徵兆吧？（《草木恩情》，頁 253）

就李喬生命史而論，山野草木作為幼年成長的生活場景與特殊景觀，草木植物的演化故事不僅具現李喬的生命特質，也讓李喬看見自己映現在自然草木世界中的位置。草木的情節脈絡，因此佔據了李喬一輩子的記憶。「返回山林」、「與

⁴⁹ 參見凌拂各篇之「說文解草」。見同註 9，凌拂，《山·城草木疏——綠活筆記》。

⁵⁰ 此為生態文學表現的特徵，參見王諾，《歐美生態文學》（北京：北京大學，2003 年），頁 9。

⁵¹ 感謝審查者之一提點 nature writing 這組複合的研究詞彙或寫作型態，所衍異不同的概念與書寫嘗試，復又提供另一種「生態批評」（ecocriticism）的討論架構，以資參考。經本人查閱相關書籍後，發現相關術語計有「生態文學」、「自然書寫」、「環境文學」等三大類，且因各國研究者所使用的術語與依據文獻，十分混亂與歧異。（相關資料，參見註 51）。若欲釐清相關學術演變與討論架構，恐非本文短製篇幅可竟其功。事實上，本文在「前言」已初步界定所依據之「自然書寫」理論，並也強調李喬自然書寫的「非典型」。謹此說明。

大自然草木合一」，這是李喬個人世界的最後回歸——情歸土地。就其創作史而觀，邁入七十後的李喬，對於平生創作主力的「小說」文類，自覺大致「已完工」（《草木恩情》，頁 253）⁵²，因而另起創作新意，所謂「這一生另一系列悠然浮現」（《游行飛三友記》，頁 4）。據此或可推論並總結其意：一、在小說之外，改換為直接呈現心意念的散文創作；二、以平日所積累之雜學，於文學學門之外，直面個人生命與物種的交融契合（《游行飛三友記》，頁 4-5、244-245）。

文學行動與反映人生，從來就不是對峙分立，而是互通聲息，匯聚合流為一。故此，李喬的自然書寫之姿，宜乎安置並見證於其總體生命背景中。其晚年孳孳於完成田野草木小史，毋寧是意在交代台灣山林田野記憶，感恩孕育生命的地母后土，而後與個人生命／時代歷史的一種話別形式。誠如作家所言：「大去之前既與草木話別，對於游行飛三界豈可無言離去？……於是哲學、宗教、科學都有些『銜接』了，以這種『狀態』，親草木友游行飛三界，想來感恩又喜悅的。」（《游行飛三友記》，頁 244-245）李喬雖於晚年締建了個人新的自然書寫創作素材與散文文類形式，然則老作家自小說創作伊始，即長期關注台灣的土地與自然，所謂「台灣土地草木化生的作家」⁵³，當之無愧！李喬草木書寫，雖從個人經驗的生命史出發，卻輻輳出台灣植物史、庶民生活史、多族群經驗、家國歷史等大敘事，李喬的自然書寫，或許非主流也非具有典型性，卻因此標記了另一種多向度的台灣田野誌！

⁵² 高齡李喬在近期新作發表的各種公開或私下場合，皆表露出「這應是最後書寫」的預告心境。事實上李喬自出版《草木恩情》後，已於 2016 年 8 月陸續完成新作《亞洲物語》長篇小說（台北：印刻，2017 年），以及《游行飛三友記》（2017 年）、《生命劇場》（台北：印刻，2018 年）。老作家依舊於《亞洲物語》〈前言〉與〈後記〉中分別宣告：「這篇作品是個人真正晚年小說。聲明於『前言』」（《亞洲物語》，頁 7）、「八十三歲生日後兩個多月，正式的八十三歲長篇小說完成。決定小說創作，從此擱筆。」（《亞洲物語》，頁 295）。惟老作家已另有新作《思想 想法 留言》付梓，將於 2019 年 6 月正式發表。

⁵³ 此語化用於李喬自稱「水土草木化身」。見同註 20，頁 421。

參考文獻

一、傳統文獻

陳鼓應註譯，《老子今註今譯及評介》（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0年）。

陳鼓應註譯，《莊子今註今譯》（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4年）。

（明）李時珍撰，《重訂本草綱目》二冊（台北：文化圖書公司，1992年）。

（清）陳培桂編，郭嘉雄點校，《淡水廳志·卷十五下·文徵》（台中：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77年）。

二、近人專書

李喬，《李喬短篇小說全集》（苗栗：苗栗縣文化局，1999年）。

李喬，《重逢——夢裡的人：李喬短篇小說後傳》（台北：印刻，2005年）。

李喬，《散靈堂傳奇》（新北：印刻，2013年）。

李喬，《情世界——回到未來》（新北：印刻，2015年）。

李喬著，蘇芳霏繪，《草木恩情》（新北：遠景，2016年）。

李喬，《亞洲物語》（台北：印刻，2017年）。

李喬，《游行飛三友記》（新北：遠景，2017年）。

方梓，《采采卷耳》（台北：聯合文學，2008年）。

方梓，《野有蔓草：野菜書寫》（台北：二魚文化，2013年）。

王學謙，《自然文化與20世紀中國文學》（長春：吉林大學，1999年）。

王諾，《歐美生態文學》（北京：北京大學，2003年）。

宇文所安著，鄭學勤譯，《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台北：聯經，2006年）。

李育霖，《擬造新地球：當代臺灣自然書寫》（台北：臺大出版中心，2015年）。

孟東籬，《濱海茅屋札記》（台北：洪範書店，1985年）。

- 吳明益，《臺灣現代自然書寫的探索 1980-2002：以書寫解放自然 BOOK1》（新北：夏日，2012年）。
- 吳明益，《臺灣現代自然書寫的作家論 1980-2002：以書寫解放自然 BOOK2》（新北：夏日，2012年）。
- 吳明益，《自然之心—從自然書寫到生態批評：以書寫解放自然 BOOK3》（新北：夏日，2012年）。
- 吳濁流著，黃玉燕譯，《亞細亞的孤兒》（新竹：新竹縣文化局，2005年）。
- 凌拂，《食野之萃：台灣野地生活》（台北：時報文化，1995年）。
- 凌拂，《山·城草木疏——綠活筆記》（新北：無限出版，2012年）。
- 許喬木、邱年永，《原色野生食用植物圖鑑》（台北：南天，1986年）。
- 陳冠學，《田園之秋》（台北：前衛，2007年）。
- 陳玉峯，《台灣植被誌第九卷·物種生態誌（一）》（台北：前衛，2007年）。
- 彭瑞金編，《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27·李喬》（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2年）。
- 琦君，《留予他年說夢痕》（台北：洪範書店，1970年）。
- 黃孫權，《綠色堆土機：九零年代台北的違建、公園、自然房地產與制度化地景》（新北：獨立媒體，2012年）。
- 趙一凡等主編，《西方文論關鍵詞》（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2006年）。
- 簡義明，《寂靜之聲——當代臺灣自然書寫的形成與發展（1979-2013）》（台南：台灣文學館，2013年）。
- 亞里斯多德（Aristotle）著，李真譯，《形上學》（台北：正中，1999年）。
- 亨利·戴維·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著，吳明實譯，《湖濱散記》（香港：今日世界，1975年）。
- 理查·梅比（Richard Mabey）著，林金源譯，《植物的心機：刺激想像與形塑文明的植物史觀》（新北：木馬文化，2016年）。
- 安伯托·艾可（Umberto Eco）編，彭淮棟譯，《美的歷史》（台北：聯經，2006年）。

三、專書論文或論文集

張系國，〈竹塹堡、科技城與烏托邦／我的科幻小說創作〉專題演講稿，收於陳惠齡主編，《自然、人文與科技的共構交響——第二屆台灣竹塹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萬卷樓，2017年），頁1-26。

四、電子媒體：

遠景文學網—書評，〈執行編輯大人，你該加油了〉，（來源：http://www.vistaread.com/reviews_dtl.php?action=view&id=179，2018年8月17日）。

